

新时期 思想政治工作 探索

戴 云 著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探索

戴 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限 表

期前将书还回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探索

戴 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58,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

书号 3074·634 定价 (五) 0.23 元

D64
1

0230591

严格的求实态度 科学的探索精神

(代序)

1980年11月16日，戴云同志因患凶恶的癌症去世。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几篇文章，都是戴云同志生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写的。

戴云同志长期从事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经担任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副部长。那时候，他就对林彪搞的那一套现代迷信，什么“顶峰”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表示极大的不满，坚决反对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做法。“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却仍然锐气不减。粉碎“四人帮”以后，戴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副主任、调研室主任。在新的岗位上，他对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思想战线上出现的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中的几篇文章，就是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经过党的三中全会，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在这

样一个新时期中，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放在什么地位？有些什么新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是有不同认识的。

本来，做任何工作都要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可是，由于在十年内乱中，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发展得十分严重，林彪、“四人帮”更打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旗号来整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名誉一度被糟蹋得很不好听。许多干部和群众对过去“左”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表示厌倦，甚至反感。这是不奇怪的。我们有些同志也误以为既然党的中心任务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思想政治工作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又比较多。有的认为党在现阶段实行的一些方针、政策，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有的认为我们过去三十年的路都走错了，中国不但现在不能算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没有取得搞社会主义的资格；有的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性；有的公开主张个人主义、自私有理有利，认为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过高要求，反而会造成道德水平下降；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当怎样认识这些情况呢？熟视无睹当然不对，惊慌失措则必然会导致采取错误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思想问题，不能单纯从思想上去找原因。戴云同志正是以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具体分析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度出现思想问题较多的形势，指出今天的情况和那时有某些相类似的地方。那时候，完成了生产资料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一下子跟不上去，必然会产生种种不适应，产生许多矛盾，社会上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人们解决。类似的情况，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就曾产生过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争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产生过如何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矛盾，产生过反对投降主义倾向的斗争。1949年，全国解放，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民族资产阶级直接打交道，随之又产生了一部分同志受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蜕化变质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动。我们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是在党和整个国家都受到十年内乱严重破坏之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任务急需我们去完成。我们又不能等待把自己肌体上的创伤治愈之后再投入战斗，而是只能一边前进，一边治伤。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方针、政策，国内的经济比以前搞得活了，对国外的开放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都必然要带来许多新问题。清除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大祸害，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国际资产阶级又必然要利用我们实行新政策的机会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些，都必然要使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面临复杂的形

势。作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要看清这个形势，从而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用党的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保证新时期任务的胜利实现。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重要意义，今天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同志，看得愈来愈清楚了。但是，戴云同志的论述，对我们仍旧有重要的启发。这就是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联系社会的变动，来观察和把握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动向，从而把人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戴云同志对 1956 年以后思想形势的回顾，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醒我们避免当时曾经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抓思想工作不对，一抓就无限上纲，把什么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乱斗一气，也不对，这样做只会扼杀社会主义的生机。过去“左”的错误的教训正在这里。党的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敢于坚持真理，不为一时的权势所压服，不为不合实际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正是戴云同志的可贵品质和特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就曾多次冒着危险，为一些受迫害的老同志奔走。1971 年，我和戴云同志刚刚被“解放”，一起下放到河南农村中。他就勇敢地批评当时把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等极左的做法，支持实行包工计酬，被当地群众称为“党的政策又回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戴云同志更坚定地反对用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来对待

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热情地宣传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宣传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这些看作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思想解放决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我们的思想应当从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应当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目的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在提出解放思想的同时，明确地一再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戴云同志也是清醒的、坚定的。有一个时期，在一些同志当中，似乎马克思主义不那么灵了，他们往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面对这样一股思潮，戴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僵化的、教条的态度，又反对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间划清了界线，并且鲜明地提出党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

党性，可以说是党的生命问题。我们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理所当然应当时刻注意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努力扩大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中国的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这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取得的经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更离不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可是，

有的同志却认为现在讲共产主义思想，讲大公无私，就是超越历史阶段。他们认为，既然当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就不能超出这个圈子。他们不懂得，经济政策和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东西。而且，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只有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政策，才不至于把“向前看”变成“向钱看”，才能使干部和群众不至于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腐蚀，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当然，关于公与私的关系的问题，不是十年八年之内，经过几次教育就能彻底解决的。在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中，人们都将面临这个矛盾。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一项基本任务。戴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结合新时期的情况，很好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对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主人翁教育、反腐败教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共产党的党性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要保持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组织。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任何一个环节弄乱了，都会对整体发生有害的影响。反映到思想工作中，就更需要加强党的统一意志，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个调，谁自己认为什么主张对就宣传什么主张，那么，即使党中央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可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而只会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带来可乘之机，

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然，我们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每一个党员自己觉悟到遵守铁的纪律的必然性的结果。它不仅不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且强调要在党内发展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党所要求的是行动的一致。党的宣传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宣传的就只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这种宣传不应当是死板的、照本宣科的，而应当是生动的、紧密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对象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党决不能允许对党的决定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更不能允许在共产党员主持的宣传阵地上和党唱“反调”、唱“对台戏”。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是做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的起码条件。戴云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读书笔记中，对列宁关于保持党的铁的纪律的思想作了透辟的论证。这些论述对于那些沾染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灰尘的同志，对于那些自以为比党中央还高明、自以为有功劳就可以不听党的招呼的同志，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党的六中全会已经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工作，用《决议》的基本结论来统一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它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在这样的時候，我们分外感到戴云同志所作的探索的可贵。这本文集

中几篇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广大宣传工作者遇到的问题。时代在前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地涌现出来，要求我们继续作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所必需遵循的根本原则，仍旧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面向实际，而不是回避现实，要精心地去找到各种不同类型群众思想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能够回答群众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效地给群众指明方向，增强信心、勇气和力量，使我们的社会，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人到少年儿童，男男女女，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人。从这一点说，戴云同志所作的努力，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余 心 言

1982年4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严格的求实态度 科学的探索精神(代序)·····余心言	(1)
谈谈大转变时期的思想问题·····	(1)
在复杂情况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	(7)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12)
铁的纪律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24)
引导青年正确看待我们自己·····	(37)
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	(45)
怎样看待公与私的矛盾·····	(63)
青年要潜心多习自然科学·····	(73)

谈谈大转变时期的思想问题^{*}

社会变动必然产生较多的思想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比较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主席就一再提醒全党同志首先是省、市以上党委领导同志，要把思想工作抓起来，要注意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他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

• 这是戴云同志1980年4月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的摘录。

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新旧交错，思想问题错综复杂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二三十年前当然是有很大不同的。既不是象解放战争胜利所带来的那种政治上层建筑根本性的大变动，也不是象三大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性的大变动。但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动，我们管它叫拨乱反正。就是说，林彪、“四人帮”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把我们国家搞乱了，现在我们要来一个拨乱反正。这种拨乱反正不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国体和政体）和根本的经济制度（所有制）的变动，而是着重在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同时也包括改变某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具体政治、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我们说拨林彪、“四人帮”之乱，当然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好的东西，而是要在新形势下大大地加以发展。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在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也有所表现，更由于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之中，经过实践的检验，过去的某些具体的制度、措施，也未尽恰当，而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改革，因此，当前这种变动是很深刻的，它将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在当前的变动中，为了纠正过去“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改革、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例如，农村

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中，有相当部分的生产队，由于集体经济长期搞得不好，要放宽政策，可以包产到户；还有过去没有条件现在才有条件搞的“租让制”式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以及经济特区等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一个长时期内将是在社会主义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这样一些变动在思想上自然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映。同时，我们又还处在拨乱反正的进程之中，除旧布新、新旧交错，思想问题比较错综复杂，是很自然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过去所说过的那样，“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今天，可以说，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拨乱反正的巨大努力总的都是热烈拥护的。然而，对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对我们的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不少人是将信将疑的。这从客观上说，也是经过多年折腾的结果。

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政策

把现在的情况和1957年类比，有些人听了可能会反感。但是我觉得这样比一下，是有必要的。因为除了新旧交替，人们的思想一下子不能完全适应，思想问题较多这些类似的地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采取正确的政策。

说到1957年，人们很容易想起反右派运动，有的同志担

心现在会不会再来那样一个反右派运动。应该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1957年的情况。从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坚决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我们党已经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个错误,以后永远也不会再干类似反右派运动这种蠢事了。我看,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现在的客观情况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有敌对分子、敌对势力同我们在思想方面的斗争,有那么一小股杀气腾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现在应该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更是大量的主要的,但是有没有这种敌对势力?有没有这种敌对的思潮?有的。有这么几种人: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还有“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

密切地联系着。

把现在的思想动态和 1957 年相比，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要求我们进行全面的分析，采取正确的政策，以避免重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那样的错误。1957 年那个时候，对待思想问题和思想斗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左”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就是不承认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不同意见，不允许人家有意见，不允许放，对双百方针思想不通，你要放，我就一概当敌人抓，抓辫子、打棍子，一棍子把你打死；另一种是右的，当时叫做修正主义的态度，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对那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不但主张放弃思想斗争，而且成了这种敌对势力和敌对思潮“最好的助手”。

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右的修正主义的，也不是“左”的教条主义的，我赞成：第一是应该批判，不批判这种思潮是不对的；第二，又不能采取反右派那种做法，那样做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对于绝大多数人，不管有的存在多么严重的思想问题，都要立足于帮，坚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来对待他们。总之，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思想界的问题。

我们的宣传工作，这一段总的有很大改进，但仍有少数同志对这点认识不足，持不同的估计和态度，关键问题还是对思想问题研究不够。为了能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地搞四化，我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更要兢兢业业，以高度的责任心来对待当前的思想问题。